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内在规律

□ 张 杰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北京 100872

一、是否存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基本稳定的规律

第一,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演变规律来看,可以得到的一个判断是,多数发达国家的比重均呈现出持续下滑的基本态势。依据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变化趋势来看,可以将这些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变化趋势归结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较大幅度下降型,比如法国、新西兰、芬兰。二是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中等幅度下降型,比如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西班牙、比利时、德国。三是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较小幅度下降型,比如瑞士、葡萄牙、美国、日本。四是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上升型,比如韩国。

第二,从全球主要新兴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演变规律来看,新兴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呈现显著的分化现象,部分新兴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呈现较大幅度下降态势,部分则呈现上升态势。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较大幅度下降型,如巴西、阿根廷、智利;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中等幅度下降型,如菲律宾、南非;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较小幅度下降型,如印度、墨西哥、埃及、越南、俄罗斯、波兰、肯尼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较大幅度上升型,如马来西亚、泰国、孟加拉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中等幅度上升型,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较小幅度上升型,如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

无论是从全球发达国家来看,还是从新兴国家的发展经历来看,似乎难以归纳出一个统一的演化规律。更为重要的客观事实是:一方面,在发达国家中,既有依靠全球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等服务业主导的类似美英发展模式,也有依靠自身国家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实力抢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高端环节的类似德日韩发展模式。而在新兴国家中,既有利用低端生产组装制造环节实现经济起飞

的亚洲发展模式,也有凭借自身特定资源要素禀赋优势或地理区位优势实现特色制造业扩张的南美发展模式,更有大量由于制造业发展动力不足而陷入经济起飞困局中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日本、韩国、美国等这些全球的典型工业化强国,在国民收入达到了相当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后,均出现了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处于基本稳定水平状态的现象。由此可以归纳出的一个基本规律是,主要工业化强国在经济发展到高度发达水平后,均出现了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处于稳定水平状态的现象,可见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维持在某一合理水平的基本稳定状态,对于保证一国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至关重要。

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变化趋势、阶段性特征和独特规律

第一,中国经济是超大规模经济体。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国家,其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必然有着自身独特的演化规律,难以借鉴其他不同类型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来机械或照搬式地简单解释,必须探索超大规模经济体切入全球开放体系中的独特发展规律,摸索在不同发展阶段制造业发展的动态演化规律。中国和美国是具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特征的国家。截至 2019 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达到 3.9 万亿美元,规模全球第一,而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规模达到 2.35 万亿美元,规模全球第二。目前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万亿美元的国家只有中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德国 2019 年的制造业增加值只有 7477 亿美元。美国利用美元世界货币霸权背后延伸的对全球金融中心的绝对控制能力,依赖全球科技创新能力的绝对领先能力背后隐含的对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垄断势力,攫取了巨额的全球铸币税和金融交易费用,以及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利益分配中的最高附加值部分,走的是一条“金融垄断+科技创新垄断”的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发展模式道路。在美国领导的发达国家联盟针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和科技创新围堵战略

的情形下,特别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经济崛起采取全面围堵和遏制战略的前提下,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维持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定水平的内在动力,只能依靠国内需求市场规律以及消费升级换代带来的高端需求市场规模,以国内大循环体系作为基本性的核心支撑力量;必须走“本土内需市场支撑+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科技创新能力”为主要特征的内部大循环为主导的,国内国际循环体系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道路。

第二,中国经济是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的有机融合。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分为:市场驱动下的演化规律和政府推动下的演化规律。充分利用政府和市场机制的有机融合体制来发展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或重要手段之一。在发展制造业方面,中国既存在超大规模经济体系所蕴含的庞大的本土市场需求优势,具有对本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生支撑动力,能够避免一味依靠外需而造成的制造业低端锁定陷阱;也有着中国各级政府制定的中长期规划,具有利用各种优惠和支持政策来促进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从总体层面来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变化趋势,必然受到市场驱动和政府推动两种力量的综合影响。

三、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变化趋势的驱动因素

第一,促进因素。首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相互支撑机制。针对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最为突出的发展优势是在国内推动和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协同机制,促进供给侧与需求侧相互支撑型的螺旋式上升的国民经济运行体制的有效形成。其次,全面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机制体制。针对深入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中国而言,阻碍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稳定甚至适度提高的最为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看能否真正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科技创新机制体制,能否强化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和基础研究能力,突破制约中国当前及未来高端制造业体系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夯实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再次,构建国内的大循环产业体系。为削弱和控制外资企业对中国产业链安全和国内产业大循环体系带来的诸多潜在风险,必须强化布局,构建以中国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国内产业大循环体系。这对于建设和完善中国的现代制造业体系至关重要,是中国能否有效促进现代制造业体系形成的基础条件和核心载体。

第二,抑制因素。首先,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实施愈加严厉和复杂的科技创新封锁和经济发展围堵战

略。其次,部分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中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带来逆全球化趋势。再次,部分地方政府不合理的干预行为导致国内关键要素市场扭曲。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各级政府针对辖区内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及其金融资源的分配和定价权采取普遍控制和干预行为。导致中国制造业发展容易陷入“产业短板→中央确定发展目标→地方政府采取各种非市场化优惠和扶持政策展开招商引资竞争→企业一拥而上→产业结构雷同和产业同质化竞争→产能过剩→大量银行贷款融资面临风险→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困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扭曲”的恶性循环。

四、今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合理的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国内外关键因素,可以得到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对内需市场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形成支撑作用的快慢,是决定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变化趋势和合理水平的核心因素。因此,要科学判断该比重究竟能在何种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状态,必须密切关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升级换代的内在特征,深入分析中国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国内产业大循环体系的形成逻辑。由此,可以做出如下几种情形的预测:情形 1:2021—2035 年稳定在 25% 左右。情形 2:2021—2035 年逐步稳定在 20% 左右。情形 3:2021—2035 年逐步呈现恢复性反弹特征,最终稳定在 30% 左右。对上述三种情形的预测,参照的是中国收入差距的改善状态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状况。其理论基础是,中国已经发展到“需求决定供给、供给推动需求”的特定阶段,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需求侧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得到切实的改革和解决,才能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纵向推进,从而促进需求侧和供给侧的相互支撑、相互牵引式的动态的高水平发展新模式的形成。这既是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内在机制,也是推动中国由一味依赖外需驱动发展模式,向以“内需驱动为主、外需有益补充”新发展模式转变的核心动力机制。从德国、日本、韩国三个全球典型工业化强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在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过程中,未来 2021—2050 年 30 年间,前 20 年中国应保持较高的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水平,比重维持在 25% 以上,后 10 年可以将比重调整在 20% 以上。针对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终极目标,20% 的水平应该是中国必须坚守的发展底线目标。

■ 《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5 期,约 16000 字